

九一一：在歷史轉折路口上的阿拉伯世界

• 勒 沃
(Rémy Leveau)



阿拉伯世界在「九一一」危機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為策劃這次事件的組織「基地」是由一個沙特阿拉伯貴族創立，這個地區因這起事件所感受到的衝擊要比其他地區都更加直接。大眾包括相當大一部分的中產階層都譴責恐怖襲擊，但對他們來講，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擊似乎是遲到的、過份的和缺乏合法性的。

從許多方面來看，阿拉伯世界在「九一一」危機中的地位都是特殊的。因恐怖襲擊的自殺者來自這個地區，再加上策劃這次事件的組織「基地」是由一個沙特阿拉伯貴族創立，這個地區因這起事件所感受到的衝擊要比其他地區都更加直接。對事件的事實、原因、同謀者的網絡等方面的分析結果，都將此地區置於風暴中心，並因此動搖了阿拉伯世界現有的各種內外平衡。那些將其存在理由深深地與美國制度相聯但已逐漸不能再忍受這種依附狀

況，並開始陰謀反抗其保護者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們被此事件深深地觸及，他們有一段時間強烈感覺被其保護者遺棄，而這保護者自己卻置身事外。

大眾包括相當大一部分的中產階層都譴責恐怖襲擊，但對他們來講，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擊似乎是遲到的、過份的和缺乏合法性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抗議常常是被禁止的，民間和軍事精英被迫有限制地表達他們對美國人的同情，條件是以一種秘密的方式表達。然而，一旦對伊拉克的某種報復行為超出限度，或者以色列利用此形勢加大其對巴勒斯坦人的壓力達到讓人無法容忍的程度，這種對美國的支持就可能立刻消失並變成一種公開的敵意。在海灣戰爭期間我們也曾觀察到這種矛盾和情緒性的反應。這些反應今日更多傾向暴力，而動員範圍也遠遠超出阿拉伯世界。同時，這些反應將阿拉伯世界置於一個更大的框架內，並因此導致其更加不穩定。

這種反應的態度也使我們思考阿拉伯世界國家內部的平衡，和那自1979年第二次大衛營協定以來確立的地區安全制度的可存續性。由於當時埃及的撤退並事先考慮了此撤退的重要戰略利益上的補償，而這種補償強固了阿拉伯專制精英們的地位，使其免去了用充滿風險的改革措施來強化其地位，這些協定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總之，這個「穩定協議」從埃及擴及到所有那些放棄使用武力來改

變現狀的行動者。伊拉克之所以在1991年被懲罰，就是因為違背了這條規則。巴勒斯坦人和約旦人也因奧斯陸協定和華盛頓協定從1993年和1994年間也加入其中。如果能夠達成太巴列 (Tiberias) 湖水分配的協定，敘利亞在2000年1月也許會在日內瓦簽署一個類似的協定。總體上講，這個區域穩定制度能夠有效運行多年，美國方面在不斷加強的參與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參與不總是站在以色列方面的，在相當大程度上也照顧到阿拉伯精英要求得到承認的願望。

相對來說，阿拉伯世界內部的穩定很快就停滯下來。在那些幾乎沒有發生人口轉型的阿拉伯國家裏，由城市化和大學教育所造就的新型中產階級的社會流動期望和社會關係的變化也因此凍結。因無法與以色列開戰而消失的民族主義話語，一方面被經濟開放政策（雖然這種經濟政策只讓精英層得利）所鼓動的消費欲望所代替；另一方面，這種民族主義話語也被一種帶有社會控制含義的針對中產階級追求身份本真性要求的宗教話語所代替。該地區因石油收入和戰略利益而保持穩定。向海灣地區和阿拉伯半島的移民潮，彌補了個人因生產性資源匱乏而感到的挫折感，也減弱了因社會動員能力的崩頹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這在埃及尤其如此。

但是，區域衝突的結束卻將那些不在此框架內的人——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暫時拋棄在路邊。海灣戰爭和蘇聯撤出此地區雖然促成奧斯陸協定的簽署，但卻枯竭了流向現已貧困化了的伊拉克和感到懼怕擔心的石油王朝們的移民流，這些石油王朝現在更願意使用亞洲的廉價勞力。這些變化將增加內部的壓力並推動伊斯蘭主義反對派的發展，使其很快成為唯一挑戰、質疑腐敗領導層和極不公正的區域制度的合法力量。

海灣戰爭後，我們並沒有看到伊朗革命的模式在阿拉伯世界擴展，而是看到那些具有外部支持和掌握資源的國家加強了其鎮壓手段以維持統一。面對國家的這種反應，絕大部分伊斯蘭主義運動變換了策略並經常發生分裂。一部分返回主流並將一些專制合法化，以這種妥協換取好處。我們大致可以將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陣線」(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FIS)，埃及的「穆斯林兄弟」(Frères musulmans)，巴勒斯坦的「哈瑪斯」(Hamas) 和土耳其的「熱法赫」(Refah) 等組織的演變歸為此類。對許多人來講，協調一致地奪取權力被視為不可能，參與到各種利益的分配決定中的希望，隨着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OLP) 加入大衛營協定的框架後便成為妄想等等，都是使對抗減少的原因。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運動也被國家殘酷無情的鎮壓所摧毀，其中最具有象徵性的是1982年敘利亞政府在哈馬 (Hama) 對「穆斯林兄弟運動」的鎮壓，造成了上萬人死亡。但是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緩慢的和平過程及其失敗，使得接受一種可能的妥協的想法逐漸貶值。面對侯賽因 (Saddam Hussein) 和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的失敗，一小部分邊緣性群體開始採取一種類似伊朗模式（這主要指在伊朗革命和兩伊戰爭中，伊朗年輕人採取的那種自殺攻擊性行為——譯註）的自殺攻擊暴力行動。

「九一一」恐怖襲擊的首要後果，就是質疑、動搖了持續20年的、主要依靠專制精英維繫的區域穩定制度，它過去幾乎沒有關注各個社會的轉變。衝突的空間是有限的，由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衝突轉變成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並越來越少接受外界的介入，只是在那些從政治和經濟上強固這個不平等的區域和平框架的情況下，某些介入才可以被接受，尤其是歐洲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幫助。突然

「九一一」恐怖襲擊的首要後果，就是質疑、動搖了持續二十年的、主要依靠專制精英維繫的區域穩定制度，它過去幾乎沒有關注各個社會的轉變。衝突的空間是有限的，由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的衝突轉變成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並越來越少接受外界的介入。「九一一」的發生，使空間發生巨變，伸延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

間，因「九一一」恐怖襲擊的發生，使空間發生巨變，伸延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阿拉伯半島因其精英與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的關聯重新被置於辯論的中心。伊拉克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受反擊的目標。土耳其將自身置於邊緣但不可缺失的可靠盟友地位。為避免以巴衝突可能導致包括所有阿拉伯國家在內的反恐聯盟瓦解，以巴衝突被邊緣化了。因另外一些原因，北非的國家衝突也大致是如此被邊緣化。此次危機的處理組合讓人想起圍繞巴格達協定 (1956年) 展開的討論與衝突，但最主要的不同在於美國的反擊得到俄羅斯支持和中國善意回應。

這個改變了的空間格局對那些承受危機壓力的國家也產生重要影響。在短期看，阿拉伯世界之所以轉向恐怖主義，可以視為政治伊斯蘭在通過控制國家權力以實現社會轉變計劃失敗的結果。缺少動搖那些大的、像埃及那樣的阿拉伯國家的能力，這些運動試圖針對那些石油王朝採取行動。在那裏，國家結構更加脆弱，而那些控制石油收入的家族網絡較那些納塞爾們的繼承者更缺乏合法性。這些家族生活在阿拉伯人無法接受的美國軍事保護之下。海灣戰爭之後，美國的軍事保護成為保持這些政體內部穩定的關鍵性因素，而不是用於保障其免於事實上已不存在的外來威脅。紐約和華盛頓受襲，可以視為先前襲擊美國大使館、軍事基地等一連串事件的延續。恐怖份子將暴力帶到美國的心臟，向世人顯示了美國必須要為保持其在阿拉伯半島的存在和維持一個對各種問題失衡的嚴重性幾乎沒有意識的阿拉伯統治階層的統治付上代價。

瓦哈比 (wahhabisme，沙特阿拉伯一個傾向禁欲的政治—宗教運動——譯註) 教義中關於國家和宗教的關係的看法，與本拉登所領導的運動在這方面的看法沒有甚麼根本的不同，這又給上面涉及的問題增加了悖論。由此可知，該運動為何長期以來與那些上層資產階級商人甚至某些接近權力的皇家成員之間具有結構上的密切關聯。對政權的抗議表現在對有關領導人的政策選擇上，以傳統的、主張大力改革的行政建議或是企圖製造不穩定這兩種形式交互表現出來。本拉登批評沙特政體向美國人獻媚，並指責其以一種不明顯但卻是實質性的方式加入大衛營協定所代表的地區穩定制度，這個區域穩定制度在海灣戰爭後因美國駐軍阿拉伯半島而得到強化。同樣，在宗教神學層面上的抗議，主要表現在對政府允許美國在這個具有特殊含義的、有着伊斯蘭兩個聖址的土地上駐軍。這種由美國來對掌握權力的統治精英提供的保護支持，遠遠超過抵禦來自外界威脅的保障這樣一種含義而成為沙特政權內部穩定的主要保證。

因此問題在於了解美國人到底是否繼續接受他們在海灣地區的存在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可以設想他們將不得不如此，以便長期維持對石油生產的控制以及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但是我們可以設問：這種存在是否將總是以美國單一介入和支持那些從大衛營協定以來就執政的專制政治、軍事精英的形式出現？

我們可以假設美國將考慮這些支持的成本。美國人並不從根本上取消這些支持，他們可能更多關注這個地區的社會的內部平衡和各種集體利益，以便落實真正的多元主義，從而為民主建設開闢道路，由此減弱該地區的激進主義勢力。這種選擇好像在 (後塔利班階段的) 政治重建中開始勾勒出來。在國際力量的保護下，在各方多元的、包括那些接受新遊戲規則的伊斯蘭主義者的認可基礎上，一個更新的阿富汗君主制或能提供一種影響區域政治空間重組的模式。

在短期看，阿拉伯世界之所以轉向恐怖主義，可以視為政治伊斯蘭在通過控制國家權力以實現社會轉變計劃失敗的結果。海灣戰爭後，美國的軍事保護成為保持這些政體內部穩定的關鍵性因素，恐怖份子將暴力帶到美國的心臟，向世人顯示了美國必須要為保持其在阿拉伯半島的存在和維持一個漠視各種問題的阿拉伯統治階層付上代價。

美國也可能不再希望獨自承擔這種任務的重負。俄羅斯(包括中國)在該地區變換了遊戲目標的政治遊戲中的重新整合、加入,也可以使人們設想歐洲的一種不再僅僅停留在經濟支持領域的新型參與。實現這種變化的手段可以是一種地中海區域的北約合作者,今日這些合作者已經伸延到絕大多數北非和中東國家和「巴塞羅那過程」間的互補協作(海灣戰爭後,美國1992年在馬德里主持召集過有關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發展的會議,歐洲只被邀作觀察員。此舉惹惱了歐洲方面。在西班牙的倡議下,1995年在巴塞羅那召集了除個別國家缺席外、所有地中海區域國家都參與的國際會議,就經濟、文化、政治合作發展展開討論,並確定了一個五十億歐元以上、歷時數年的合作發展計劃——譯註)。若要維繫阿拉伯地區的穩定,必需考慮這些社會變革的要求,而不應只為阿拉伯專制精英提供保障,同時,也應開闢一個與未來的巴勒斯坦國關係和緩的以色列的合作空間。

從這些展望來看,需要美國和歐洲互補的參與形式。不應減少對該地區的經濟支持,但卻應以更平衡的方式進行,同時考慮到繼續發展那些能夠有收益的生產活動。為了使該地區的社會有新希望,歐洲應該放鬆那些自90年代以來設立的有關人員流動方面的限制。一個擴大了的穩定空間,將質疑該地區國家的絕對主權特徵。這個穩定性也意味着為少數族群和社會團體提供新的保護。然而,在國家層面上,這種保護形式現在已不再可靠。對該地區的金融援助和重新啟動人員的流動,應該能夠使這個地區的國家接受歐洲具有彈性的、在變動的區域格局內進行介入的實踐形式。

我們無法肯定這些措施能夠消除所有暴力,但它們將有助於建設協調治理各種共同關係的集體空間,包括管理某些地區性的社會秩序的形式。對那些將自我置於限制之外的人的約束將成為合法性的,而現在卻好像難以找到有效地對付恐怖主義的方法。新的一頁歷史將開始,就像1979年是那上一個時期的參考年份,就像二戰結束時或是更久遠但卻仍然因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簽署於1916年5月16日的英法間的就瓜分前奧斯曼王朝的秘密協定——譯註)和《鮑爾弗宣言》(*Déclaration Balfour*, 鮑爾弗[Arthur J. Balfour, 1848-1930], 英國前首相和外相, 1917年發表宣言稱將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給予猶太人建設一個家園——譯註)而在現實中存在的年代。2001年9月11日的危機也應該成為造就一個新的、遠超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間的機遇。我們可以這樣設想,這個區域的穩定將取決於:改善其內部的穩定,以更好的方式分配收益和資源,以及一個為民主開放做準備的對不同形式的多元化的有效管理。美國沒有辦法獨自承擔保障這個穩定性的沉重經濟負擔和政治風險。一種彈性、可變的對稱聯帶(就像在巴爾幹,在聯合國,北約和歐共體之間合作的成果那樣)或可為解決這個地區的衝突和重建一新的區域秩序提供必要的手段和途徑。

張倫 譯

勒 沃(Rémy Leveau) 1932年生,法國政治學者,法國政治學院教授,以研究阿拉伯政治聞名。曾以學者、管理者、外交官和政府顧問等身份在阿拉伯世界許多國家生活多年。著有《在法國社會的穆斯林》、《阿爾及利亞在戰爭中》、《伊斯蘭在歐洲》、《阿拉伯半島的也門》等。

若要維繫阿拉伯地區的穩定,不應只限於為阿拉伯專制精英提供保障。「九一一」事件也應該成為造就一個新的、遠超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間的機遇。我們可以這樣設想,這個區域的穩定將取決於:改善其內部的穩定、更好地分配收益和資源,以及一個為民主開放做準備的對不同形式的多元化的有效管理。